

► 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 ◀

西方战略经典

A. 约米尼/等著

下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trategics

启迪智慧
把握命运
创造辉煌

本书是你的最佳选择

时事出版社

西方战略经典

A·约米尼等 著
范林森 译校并汇编

时事出版社

► 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 ◀

西方战略经典

A. 约米尼/等著



The Classics of Western Strategies



本书是你的最佳选择

时事出版社

战 略 论

[英]B.H.李德·哈特 著

序

氢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兵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到当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原子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邱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氢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简单的方法。诚如邱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日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会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

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其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原子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不安全的和平。经历了8个神经紧张的年头之后，核热武器的生产更使“胜利的国家”日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这还不是其唯一的效果。

即令还只是在试爆之中，氢弹即早已比任何的东西，更足以证明出用“总体战”当作方法，和用“胜利”当作战争目标，是如何的荒唐。这两个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观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连主张战略轰炸的巨子们，也都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英国空军元帅斯雷索爵士(Sir Joen Slessor)，最近曾经发表他的见解说：“40年来，我们所知道的总体战，现在是已经过时了——今后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其结果无非是集体自杀，而人类的文明亦将就此结束。”英国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强调过这一点，他说：“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不是决斗，而是交互自杀。”

可是接着他又说：“这种趋势似乎可使侵略行为不致受到鼓励。”——这句话却比较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冷血的侵略者，也许会估计到他的对手有一种不愿意自杀的先天犹豫心

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对那些不是明显致命的威胁,可能就不会采取立即的反应。

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当它达到这个地步时,是否会敢于使用氢弹,以来回应一个间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连空军的领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们说,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那么若是再感到跃跃欲试的话,则似乎真是疯狂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除非这个威胁,要比氢弹本身还更可怕,否则就决不会有人使用氢弹。

政治家想把这种武器用来当作对于侵略的一种吓阻工具,这种信念的基础实在是一种幻觉。使用这张王牌的威胁可以当作是一种虚声恫吓。可是事实上,苏联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它似乎是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却也许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会害怕苏联的战略空军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假使说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那么它的“后膛爆炸力”早已证明出来是有很大的损毁力量。

对于“遏制”政策而言,氢弹不特无益而又有害。它固然可以减低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它却也使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助长了间接局部性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型式虽各有不同,而其设计着眼点却是完全一样的——设法使对方犹豫不决,不愿意使用氢弹或其他原子武器。

要想“遏制”这种祸害,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性的方法,我们在方法方面可以翻陈出新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原子空

权论者的假想是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对于旧时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对手今天所发出来的战略,其基本的着眼点有二:(一)闪避优势的空权;(二)使优势空权无用武之地。很够讽刺的,当我们对轰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我们愈促进了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白把握住这个观念为基础,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决定它的方向。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战略,成功发出一种有效的反战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附带地说明一句:想用氢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其结果则是减少了可以做我们“第五纵队”的材料。

认为原子武力即足以取消战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它既然使毁灭达到“自杀”的极致,其结果一定会促使人们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间接的路线上——这本是战略的精义。它为战争带来了智慧,使战争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战中,早已有很多的迹象,足以证明“间接路线”的价值——在那次战争中,战略所担负的角色,远比一次大战中更为重要,虽然大战略方面却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着惯用的路线,用原子威慑力来采取直接行动,则结果反而会使侵略者在战略上坐享渔人之利。所以当原子武器日新月异之际,我们对于我方所具有的战略力量,也必须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发挥配合的效力。严格说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化的记录。

从本书的初版(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为书名)迄今,已经25年了。1941年曾经有一个增订版,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书名发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也曾经一再再

版,不过现在都早已销售一空。此外,这个增订版也从来不曾在美国出版。自从二次大战后,外国的译本数量大增,似乎显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于是我就乘着这个机会,把内容又作了一次增补。这样一来,书的篇幅就更扩大了,不过我对战后的说明,还是力求简洁,避免琐碎的叙述。只有如此,才不会有见树不见林之弊。

当我在研究古今的无数战役时,我才发现到,间接路线实在是远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在此,我还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的。不过经过了更深入的思考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间接路线,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这都是一条不易的定律——这也是一条哲学上的真理。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加以解决。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个新观念的直接攻击,结果必然会挑起顽强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难以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渗透手段,用侧击的方式,则其收效反而会更容易和更迅速。从政治的领域以至于谈恋爱的场合,间接路线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用讨价还价的手段,则成效的机会可以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一个新观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认为这正是他自己的观念!这和战争中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克服敌人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线之外。

在一切和人的因素有关的问题上,间接路线的观念都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人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上,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这却与下述的另一种见解颇难调和——只有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真理,始能获得真正的结论。

历史固然证明出来,“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极重

大的贡献——这也表示出,当一个人看到真理之后,若对于它做无保留的表达,还是能发挥终极的实际价值。不过历史却也同样明白的显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观点为大家广泛的接受,还需要有另一类人物的努力。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的战略家,在真理与人们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间,获致一个折衷的解决。决定他们成就的因素有二:(一)他们自己对于真理的了解与人们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二)当他们表达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智慧。

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这是他们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足以证明他是失败者,没有达成他的任务。这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并未认清他的任务和先知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做最后的裁判者,以来判决这种牺牲是否值得——一个领袖的身分而言,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则这种失败也许又适足以增加其光荣。至少,他已经避免了一般领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为“便宜主义”而牺牲真理,可是对于结果却并无真正利益之可言。假使一个人总是惯于为了眼前的利害,而牺牲真理,则从你的思想子宫中所生产出来的,一定都会是个畸形的婴儿。

那么有无一种实际的方法,折衷于二者之间呢?一方面不违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是会遭到反对的,尤其是当它采取一种新观念的形式时更是无可幸免。但是这种抵抗的程度,却可以设法减轻——那就是

不仅要考虑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更要考虑到进行的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而尽量采取侧翼上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不过,在任何一类的间接行动中,都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要背离了真理,否则就会遭到更大的失败。

从每个人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意义。每当一种新观念想要获得大家的接受时,最容易的方式即为设法使大家认为这并非一种崭新的东西,而只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被加以摩登化而已。这也非故意作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脑筋,去寻找新旧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下面所说的即为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我们证明了机动化装甲车辆就是古代装甲骑兵的承继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他们马上就自然而然地回想到骑兵在过去战争中所担负的决定性任务。

孙子语录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人皆知我之所以制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胜之形。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围师必阙，穷寇勿追。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第一章 20 世纪以前的战略

一 绪论

“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却宁愿利用别人的经验。”这句话据说是俾斯麦说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最先发现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对于军事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其他的行业不同,一个“正规”军人并不能经常地实习他这种职业。所以甚至有人会强辩着说,军人这一行职业,简直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casual employment)。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当过去实行佣兵制的时候,军人倒还可以算是一种职业,为了战争的目的,他们才受雇和领饷。可是等到佣兵制度为常备兵制度所取代以后,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也都可以照样领到薪饷了。

关于这种严格说来并没有“职业军人”的辩论,假使说在工作方面,对于今天多数的军人并不适用,那么至少在练习方面,却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比之从前,战争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越来越大。在平时所谓训练也者,即令是最好的,也都只是“理论”多于“实践”。

但是俾斯麦的名言在这个问题上,却又投射出一线新希望。它使我们认清了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

(pactical experience): 直接的和间接的。而在这两者之间,间接的实际经验可能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即令在一个最活跃的职业中,尤其是一个军人的职业,其实习的范围和可能性一定还是十分有限。与军事作一个对比,医师这一行职业可说是具有极大的实习机会。可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进步,多数还是要归功于科学思想家和研究工作者,而并非实际开业的医师。

直接经验有其先天上的限制,无论对于理论或应用而言,都不足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基础。最多它只能造成一种气氛,这对于思想结构的精炼化具有相当的价值。为什么间接的经验能够具有较大的价值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种类较多,而范围也较广泛。“历史是一种普遍性的经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人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经验。

为什么要把军事史的研究当作是军事教育的基础,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根据。对于一个军人及其心智的发展,它都具有无上的实际价值。不过也和其他一切的经验一样,这种研究的成就应决定于下述的两点:它的范围宽度以及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有一句常被人所引用的格言:“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大多数的军人都一致接受这个广泛的真理。实际上,这种算术上的比例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假使兵器不适合,则士气也就会随之减退,而在一具死尸上面,连最坚强的意志力也都会丧失了它的价值。不过尽管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是分不开的,可是拿破仑这一句格言却还是具有不朽的价值,因为它表现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一切军

事性决定中,精神因素居于首要的地位。战争和会战的结果经常以它们为转动的基础。在战争的历史中,它们成为一种最具有“常”性(constant)的因素,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而其他的物质因素,则几乎在每一场战争中和每一种军事情况下,都可以完全不同。

这种认识对于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研究军事历史的整个问题,都具有影响作用。近代的研究方法常常是选择一两个战役而加以深入的研究,想以此来当作职业训练的工具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不过这种基础的范围却很有限,无法表示出从这一场战争到那一场战争之间军事方法(工具)的连续演变,所以很具有危险性,会使我们的视界狭窄,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唯一经常不变的因素就只是下述的事实:一切工具和条件几乎经常是在变化之中。

反过来说,人类天性对于危险的反应却几乎很少变化。某些人,由于遗传、环境,或训练的影响,其反应可能不像旁人那样敏感,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并非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若愈局部化,则此种程序上的差异愈不明显,也愈难计算。我们固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人们在何种情况之下,会具有多少的抵抗力,但是下述的判断却是人尽皆知的:受到奇袭时的抵抗一定会比在有戒备时较差;在饥寒交迫时的抵抗力一定会比暖衣足食时较差。心理观察的范围愈广,则研究的基础也就愈佳。

心理因素既然比物质因素还重要,而且它又具有较大的“常”性,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任何战争的理论,在基础方面总是越宽广越好。除非我们对于全部战争的历史,都先具有广泛的知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对某一特定的战役作深

人的研究,否则这种深入研究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入迷途。反之,假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一共有二三十次的例证,都足以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时,那么我们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是任何战争理论中的一个完整部分,似乎也并非没有理由了。

这一本书的内容就是这种“广泛”观察的结果。实际上,它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的职业有关。以前,我也只是就兴趣之所趋,个别地研究某些时代的战史,可是这个工作却强迫我不得不对各个时代作一个普遍的观察。一个观察者——甚至于只是一个游历者——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却也至少能够具有较广泛的看法,而一个矿工却只知道他那个坑道以内的一切。

在这个观察之中,我逐渐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从古到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和难以应付,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却一定总是心理性的。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

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以来“直接”地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拿破仑的名言——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即足以清楚的说明这个理由。我们也可以更科学化的把它的涵义再重述一遍:一个敌军或敌国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其表现的方式就是它的数量和资源,可是其真正的基础却

是指挥、士气和补给上的稳定性。

沿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其结果适足以巩固敌人的平衡,因而也增强了他的抵抗力量。战争也和摔跤一样,假使不先使敌人自乱步骤和自动丧失平衡,而企图直接把敌人弄翻,结果只会使自己搞得筋疲力竭——用力愈大则输得愈惨。除非双方的实力太悬殊,否则这种笨方法是绝不可能获胜的。而且即令获胜,也不易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多数战役中,首先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丧失平衡,常常即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

一个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即足以使敌人“丧失平衡”(dislocation)。诚如以下分析所显示出来,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卡门将军(Gen. Camon)的研究指出,当拿破仑指挥作战时,其经常不变的目标和方法,就是“敌后的活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eres)。所谓间接线路的战略,实际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而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门所注意的主要是物质性的行动——时间、空间和通信交通等因素。但是从心理因素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许多战略行动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和向敌后的活动在表面上并无相似之处。可是这些却也都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重要例证。

要发现这种关系,并想决定这种行动的性质,并不需要把双方的实力数量,以及补给运输的详情,全部表列出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这一套综合性的例证中,找到其历史性的结果,并且研究引出这些结果的物质上或心理上的行动是什么。

假使不管条件如何的变化,某种类似的行动即足以引起